

● 吕 芳 举

经济发展与经济稳定

——在稳定中求发展

一、历史的回顾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人民用三年时间（1950—1952年）恢复了因长期战乱而陷于瘫痪的国民经济。从1953年开始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工业化历程，就是从这样一个很低的起点上起步的。在大规模建设的基础上，社会生产得到很大的发展。在1953—1988年的36年间我国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为8.8%，国民收入为6.9%，工业总产值为11.7%，农业总产值为3.8%。从经济增长速度看，我国已大大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年平均增长2—4%的速度。在这个期间，我国还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部门，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随着生产的发展，我国人民的生活也有了显著的改善。全国居民每人每年的实际消费水平，1952年为76元，1988年提高到639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平均每年增长3.7%。全国居民中绝大多数人已解决了温饱问题，一部分居民开始向小康水平迈进。应当指出，我国是一个拥有11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在占世界十四分之一的土地上解决了世界上五分之一以上的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是，40年来我国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经济增长速度时而高涨，时而下降，几次出现大起大落，使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损失。

在1952—1978年的27年间，我国经济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指引下，发展是倾斜式的，各部门的发展速度很不平衡。如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近27倍，轻工业总产值增长了8倍多；从工农业发展速度的对比看，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5倍，而农业总产值只增加了1倍多。但这27年的经济倾斜增长又可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1953—1957年）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集中物力财力进行工业建设，工业的超前增长和经济结构的改善，互相促进，从而形成了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故而这一时期可称为良性倾斜增长阶段。第二阶段（1958—1978年）是我国经济非良性倾斜增长时期。在此期间，经济工作出现了几次重大的失误。1958年“二五”计划开始后，决策机构在对国家经济实力未作科学分析的情况下，轻率地提出用几年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顾客观实际，盲目确定超速增长指标，而且通过行政系统，逐级下达、层层加码，以期超额完成。在这种急于求成、主观冒进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开始了全面“大跃进”。由于主观愿望超过了客观可能，破坏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使得我国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挫折，结果是国民收入连续三年大幅度下降，最终不得不用三年时间（1963—1965年）进行调整。1966年“三五”计划开始后，决策机构又在积极备战思想的指导下，把投资重点从沿

海转向内地，按照“靠山、隐蔽、分散”的原则进行建设。因生产布局不合理，厂址建设过于分散，不少现代化企业被分割几处，其间山川阻隔，交通运输不便，生产过程衔接困难，致使大量投资难于发挥应有的经济效益。随之而来的“文革”风暴又席卷了全国，使得工业陷入半停产状态达两年之久。据估计，这场风暴对我国国民经济造成约5000亿元的巨大损失。这些人为的决策失误严重地贻误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转变，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和措施，使我国经济转入一个新的带有补偿性的倾斜发展阶段，从而取得经济基本稳定的发展效果。例如采取放慢重工业的发展速度，优先发展轻工业，减少生产性投资比重等措施，缩小了资金缺口。又如在保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广开门路，疏通各种就业渠道，使就业压力得到缓解。再如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对农副产品价格的调整，有效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从而加强了农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撑力。由于采取了以上带有补偿性的经济政策和措施，使严重失衡的国民经济结构得到了改善，缓解了资金、就业和农业等三大矛盾，从而促进了国民经济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从1979年到1985年，我国国民收入年平均递增速度达到8.8%，比前30年的平均增长速度6.6%高出两个多百分点，居民消费水平年平均递增8.5%，是前30年年平均增长速度的3倍。可以说1979—1985年这一时期是继“一五”计划时期以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又一个繁荣时期。

1985年我国进入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时期。随着改革的深入，卓有成效地解放了被旧体制束缚的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但是在改革过程中，由于急于求成的思想重新抬头，同时也由于受到西方“通货膨胀有益论”和“财政赤字无害论”的影响，盲目扩大投资，提高消费。再加上在新旧体制的转换中，扩大了地方和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以及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初步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它们在自我利益的驱动下，容易产生投资饥渴症和扩张冲动，而我们预算的软约束和宏观调控手段的失灵，又很容易使这种扩张的欲望变成现实。于是在上述诸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出现了经济过热、社会需求膨胀、供求总量失衡和结构性矛盾加剧，以及物价上涨过猛、通货膨胀加剧等问题，这些问题在1988年表现得最为突出。

(1) 宏观经济膨胀，即宏观经济需求超出了国民经济实际生产能力，而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双膨胀”又是1988年我国宏观经济膨胀的特点。

首先，投资总量不断膨胀。全国在建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过多，规模过大，超过了国力承担的可能。从1982年到1988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由1230亿元急剧扩大到4200亿元，6年增长2.4倍，平均每年增长22.7%，大大超过同期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9.5%的速度。同时投资结构也不合理，基础产业投资不足，加工工业以及楼堂馆所等非生产性建设投资比例过高。由于把有限的资源过多地投入加工工业和非生产性建设，在工业生产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加剧了能源、原材料和运输能力的紧张程度。

其次，消费需求膨胀，社会购买力的增长超过了商品供应量的增长。例如1984年到1987年居民货币收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2%，高出同期国民收入平均增长10.9%的速度一倍还多。消费需求增长过多地超过生产发展，必然造成供给与需求的失衡。据统计，1988年社会商品可供量与购买力之间的缺口超出1000亿元以上。由于社会需求膨胀，而有效供给不足，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供需总量的差额1988年已有2243亿元之巨。

(2) 结构性矛盾加剧, 比例关系失衡。农业发展滞后, 工业发展“过热”。如1987年工农业增长速度之比为3:1, 1988年猛然扩大到7:1以上。

在工业内部, 加工工业盲目发展, 基础工业能力不足。1985~1987年, 原材料、能源等基础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年平均在10%左右, 而同期加工工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都在20%以上。这种情况使生产用电极为紧张, 原材料供应不足, 致使一些加工工业生产设备闲置。例如我国目前拥有金属切削机床约340万台, 因材料短缺, 利用率只有50.3%, 一半被闲置。

交通运输能力与国民经济发展的矛盾加剧。1986~1988年我国铁路系统年均基建投资仅为1985年的80%。由于投资不足, 陈旧设备难于更新, 新线铺轨里程下降, 几年来铁路运输任务主要靠各种设施的超负荷运转和运力挖潜维持。每公里铁路营业里程负担的周转量, 1988年同1978年相比, 货运增长70%, 客运增长1.7倍。尽管如此, 目前总运力也只能满足实际需要量的60~70%。几年来, 公路负荷密度也成倍增加, 港口建设和内河航运也都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 随着经济的发展, 交通运输全面紧张的程度有增无减, 特别是北煤南运, 西部地区煤炭、矿产品的东运更加紧张。

(3) 国家财政支出大于收入, 信贷规模膨胀, 货币发行量过多。自1978年以来, 国家财政收支几乎年年有赤字。1985~1988年信贷规模年均增长24.36%, 其中工业流动资金贷款年均增长24.1%, 远远超过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10.7%和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7.7%的速度。近10年累计净投放货币突破1800亿元, 比1978年末的212亿元增长9倍多, 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

(4) 通货膨胀明显加剧, 物价上涨过猛。通货膨胀的加剧是经济过热, 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 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的结果。通货膨胀的加剧又必然导致物价的迅速上涨, 近几年物价上涨的幅度越来越大, 1984~1987年, 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提高了24%, 年均上涨7.4%, 1988年比上年上涨幅度高达18.5%; 而且涨价商品的品种多, 在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统计的1500多种商品中, 涨价面达90%以上。

(5) 法制不健全, 流通领域秩序混乱。近几年我国经济生活出现了混乱的现象, 工农兵学商, 大家来经商, 以致流通领域, 经营环节太多, 各种经营性公司泛滥成灾, 非法经营、中间盘利、囤积居奇现象十分严重。相当一部分行政性公司, 利用权力抢购、套购紧俏物资, 或把计划内物资转手高价出售, 倒买倒卖, 赚取非法利润。一些紧俏物资经多次转手倒卖, 价格一涨再涨, 不仅影响生产, 也影响人民生活和社会的安定团结。

鉴于以上问题的严重性, 我国政府在1989年初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 以期消除经济过热、遏制通货膨胀、缓解供求总量失衡、调整产业结构, 来保证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综观我国40年国民经济发展的历程, 可以明显看出, 国民经济的增长几次大起大落, 造成巨大损失, 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 而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均衡关系遭到了破坏, 经济失去了稳定的基础, 则是重要因素。

二、在稳定中求发展

经济稳定一般是指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比例关系协调和供求总量基本均衡的状态。历史已经证明, 只有在经济稳定的基础上, 经济发展才能顺利地实现。但是, 由于国民经济是一个复杂的不断运动的有机整体, 它的发展, 客观上存在着两种趋势: 一方面, 国民经济各部

门之间存在着互为条件、均衡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分工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大大提高，相应的会形成一些新的生产部门，这就必然要改变旧的均衡关系，在提高了的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均衡关系。因此，国民经济发展本身就是一个由均衡到不均衡再到新的均衡的矛盾运动过程。从这方面来说，经济的均衡与发展或稳定与发展，又是一种辩证关系。

为了在持续稳定的基础上，有效地发展我们的国民经济，避免大起大落，必须正确处理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1）稳定和增长的关系。严格地说，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两者是有区别的。经济增长是指更多的产出，不仅包括因扩大投资而获得的增产，也包括因生产效率提高而获得的增产。经济发展除以经济增长为其主要内容外，还包括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的改善，以及科技文教事业的进步等等。但是在我们的实践中，往往只注意经济的发展而忽视经济的协调与稳定。具体地说，就是只重视增长速度而忽视比例的协调关系。这就不可避免地使经济增长处于大起大落的状态。当然，经济的稳定发展或均衡增长决不意味着增长速度逐年绝对相等。事实上，由于各种经济因素的作用程度时有变动，各个年份的经济增长率有升有降是完全可能的，而要求各年经济的增长率完全相等则是不现实的。所以经济的稳定发展或均衡增长，是指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基本协调和供求总量基本均衡的前提下，经济的逐年增长速度起伏平稳，差距不致过大的状态而言。

（2）增长速度和经济效益的关系。我国过去的经济建设经验表明，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两种增长速度：一种是经济均衡发展，宏观经济效益好的增长速度；另一种是经济畸形发展，宏观经济效益不好的增长速度。只有前一种增长速度才能实现经济的有效增长，真正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目前我国已有相当大的工业基础，提高经济效益的潜力很大，如能将经济增长建立在提高效益的基础之上，即使增长速度放慢一点，经济发展的成效并不会降低，甚至会提高。因此，今后我国经济增长必须走提高经济效益之路。当然，提高经济效益不能单单着眼于个别单位的眼前利益，还必须考虑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应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有机结合起来。

（3）总量均衡和结构优化的关系。近年来，我国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的失衡状态日益加剧，供需缺口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除近期采取压缩社会需求的措施外，必须加快调整产业结构，以求增加有效供给。首先，要加强农业，扩大对农业的投入，提高农业产量，增强农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撑力。其次，提高能源、原材料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投资比重，建成一批重点骨干项目，缓解这些部门愈加严重的“瓶颈”状态。第三，促进加工制造业的改造、改组和产品升级，使重加工工业能提供国内所需的大部分设备，耐用消费品基本上完成国产化，并提高加工制造业的产品在出口商品中所占比重。第四，重视发展第三产业，进一步提高它在就业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

（4）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加强农业、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业都需要大量资金。虽可适当引进外资，但要考虑偿还能力。所以资金来源只能以国内积累为主。要积累大量资金就必须保持较高的积累和投资率。故此，适当抑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是必要的。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为了建设“四化”大业，必须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决不能提倡高消费。

（5）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关系。改革的目的在于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

适应生产发展的部分，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体制改革与经济建设之间是没有矛盾的。为了克服旧经济体制的弊端，继续推行现代化经济建设，就必须积极稳妥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当前实行的治理整顿，是为了理顺相当混乱的经济关系；深化改革，其目的也是为了促进现代化经济建设。一句话，经济建设是中心，体制改革和治理整顿都是为这个中心服务的。把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对立起来，或者把体制改革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都是不对的。

由于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因此，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在现阶段，还不能完全放弃国家对经济的宏观控制，许多方面还需国家直接干预，集中必要的财力和物力，推动经济发展。问题是在指导性计划方面，主要是加强国家的调控手段，改变目前指导性计划流于形式的状况，使之真正起到计划指导的作用。

近几年来，在改革中推行承包制度，虽有初步成效，但由于国家放权让利步子过快，利益主体发生变化，同时财政包干、行业包干、企业承包等制度又不够完善，使中央掌握的财力、物力占社会资源的比重下降较多，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国家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物资基础和宏观调控手段的功能。所以为了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必须适当提高中央财政集中程度，强化国家对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的税收调节；强化银行调节社会资金的能力，逐步消除目前存在的资金“体外循环”的现象；对生产建设和流通的主要方面应坚持实行严格的指令性计划。这也是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必要措施。

国内外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在短缺经济条件下，由于供给不足，试图用通货膨胀办法，靠牺牲货币稳定来促进经济发展，势必造成物价猛烈上涨，价格严重扭曲，产业结构恶化，分配不公，民心不稳的严重后果。因此，稳定货币也是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我国全国货币流通量在1983年底只有530亿元，1988年底增加到2134亿元，5年间增加了3倍，平均每年增长32.1%，大大超过经济增长速度，使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可以说，这几年工业生产超高速增长，固定资产规模急剧扩大，消费需求不断膨胀，许多财政支出过多增加，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靠多发钞票支撑起来的。钞票发得那么多，而物资和商品供应又增加有限，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差额就必然不断扩大。通货膨胀的结果是生产资料价格、消费品价格、工程造价都大幅度上涨。

我国当前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经济过热和社会需求过旺引发的。因此，遏制通货膨胀之道，就是把发展速度降到比较合理水平，把过大的社会需求压缩下来，同时努力改善和增加有效供给。就我国去年出现的经济过热而言，主要是指工业尤其是一般加工工业增长过快。那么，根据我国现有经济状况，什么样的发展速度才比较合理呢？首先谈工业发展速度。我国工业增长的制约因素，首先是农业。从国外经验看，一些国家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农业与工业的增长速度之比，在初期阶段为1：3左右，在中期阶段为1：2~2.5左右，在后期阶段约为1：1.5~2。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尾端或中期的起步阶段，农业与工业的增长速度之比拟应保持在1：2.5~3左右为宜，今后我国农业的正常增长速度大体为3—4%，从而工业的增长率应保持在8~10%之间，否则，农业将难以承受工业增长的负担和压力。

如果再从制约工业生产发展的另外几个因素分析，今后我国工业生产增长速度以每年增长7%为宜。根据是：第一，能源和原材料供应紧张状态短期难以有较大改变，资源约束力强。再加上交通运输设备落后，总运力低，赶不上生产发展的需要，这个矛盾一时也难以完全克服，因此，工业增长速度大体上只能安排在6~7%。第二，从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的

需要看，我国目前工业正面临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益很差的问题，这就要求工业生产发展不能过快，以便调整产业结构和致力于经济效益的提高。

按照以上的分析，我国农业增长速度为4%，工业增长速度为7%，并且考虑到其他产业适当增长，那末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似可确定为7.5%。这样的发展速度应当说是适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合理速度。用国际水平衡量，这个速度属于中等发展速度。当然，随着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经济实力的增加，经济结构的改善，将来也可适当提高经济发展速度。但即令到那时，也仍然不能脱离稳定的经济基础。

三、近期目标和步骤

当前我国正在通过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使经济走出困境，为今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铺平道路。因此，近期目标应以稳定经济、调整结构为主，经济增长保持中等速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要下决心办成几件实事：

(1) 消除经济过热，把发展速度降到合理水平。根据前面的分析，今后一定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应保持在7.5%的合理水平。拿前几年的发展速度与此相比，如1985年的17.2%、1986年的9.8%、1987年的9.4%、1988年的11.4%，都显得过高了。

就我国工业发展速度来说，应保持在8~10%的合理水平。前几年出现了超高速增长的局面，如1985年为18%、1986年为11.1%略有下降，1987年又上升为16.5%，1988年竟高达20.7%（不包括村及村以下工业为17.7%）。工业这种超高速增长给我们的经济建设带来一系列的矛盾，特别是加工工业盲目发展，使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加剧。故此，为了保证经济协调稳定、持续发展，必须把这种超高速的工业发展速度降下来，降到合理的水平。

(2) 大力加强农业，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调动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引导农民充分利用现有耕地合理安排各种主要作物的播种面积，采用先进适用的科技，提高复种指数，争取粮棉油的产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以缓和农产品的供需矛盾。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今后一定时期内，应保持在4%的水平。根据是：第一，从历史经验看，1957~1978年的26年间我国农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3%，其间除个别年份出现负增长外，其他年份一般约在4%左右。第二，从农业增产可能性分析，一方面改革初期推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的促进作用，近几年来已开始减弱；另一方面某些高产地区增产的潜力有一个限度，而且全国可开垦的荒地不多，原有耕地面积又逐年减少，故此，种植业的增产速度受到制约。第三，从社会需求方面分析，一方面今后我国人口不断增长，增长速度将保持在千分之十三的水平，每年将增加1400万的人口；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要求增加动物蛋白和食品的多样化，需要加快畜牧业、渔业和林业的发展。考虑到这些因素，今后我国农业生产不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就难以适合社会需要。何况我国是一个拥有11亿多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粮食问题，无论是从国际市场的供应潜力看，还是从我国外汇的支付能力看，都不可能依靠进口来解决。

(3) 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压缩过大的社会总需求，努力改善和增加有效供应。首先，要坚决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压缩投资规模的关键在于彻底清理在建项目，坚决砍掉一大批楼堂馆所和非生产性建设项目，停建缓建一批生产性建设项目。为了切实解决一些地方假压缩真膨胀的问题，国家可以考虑适当上收投资项目审批权。从投资资金的来源结构看，预算内资金用于投资部分增长有限，主要是银行贷款和预算外资金两个方面的投资膨胀。因

此，对银行投资贷款应归口由建设银行集中管理，按国家规定，从严掌握；另外还要禁止非银行金融机构从事投资信贷活动，限制通过社会集资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其次，要严格控制消费需求的过快增长。控制消费需求的重点，一方面要坚决压缩和控制社会集团消费。另一方面要严格控制工资总额的增长，坚决制止滥发奖金、实物和擅自扩大津贴补贴的发放范围。

同压缩上述社会总需求相适应，金融和财政必须实行紧缩的政策，继续抽紧银根，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在紧缩资金供应总量的前提下，合理调整信贷结构。财政要坚持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逐步减少赤字。为了缓解市场供求矛盾，保障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需要，在压缩社会总需求的同时，还必须努力改善和增加有效供给。改善和增加有效供给的办法是：大力加强农业，充分挖掘现有工业企业的潜力，改进技术，加强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开展双增双节活动。

（4）狠抓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为了促进我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必须狠抓经济结构的调整，实现优化结构，提高国民经济的效益。在调整经济结构的问题上，除大力加强农业外，还应做到：一是有重点地加强能源、交通和重要原材料等基础工业。我国能源、原材料供应和运输能力都十分紧张，这是当前第一位的结构性矛盾。缓解矛盾的对策，一方面要提倡节约、降低消耗，另一方面要合理使用有限的开发、建设资金。二是抑制加工工业特别是一般加工工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过去在财政分灶吃饭的条件下，各地区竞相发展建设周期短、利润率较高的加工工业，造成盲目生产、重复建设的严重情况。因此解决问题的办法：一是调整和改进财政包干体制。二是打破行业界限，按专业化生产原则重整加工工业，坚决压缩和控制长线产品生产，增加和开发短线产品，提高产品质量。三是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对乡镇企业进行治理整顿。

围绕着上述产业结构的调整还需要：第一，相应地合理调整企业组织结构和地区经济结构，从体制上和政策上为充分发挥大中型国营企业的作用创造条件。发挥地区优势，使全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在地区空间上作出最佳选择，以保证地区经济大体协调发展。第二，根据我国人口众多的特殊国情，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以缓解人口就业压力，促进国民经济整体效益的提高。第三，在投资、信贷、税收、价格等方面要实行重点倾斜和扶优限劣的政策，大力促进整个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5）认真整顿流通秩序，遏制通货膨胀，逐步稳定币值，稳定物价。一是要认真清理整顿几十万各类公司，凡是以倒买倒卖、牟取暴利，以及对生产和流通又不能起促进作用的公司要坚决撤销。二是建立健全公司经营有关法规，加强工商行政管理和审计的检查与监督。三是为保证重要紧缺商品的合理分配使用，必要时适当扩大专营范围，严禁利用专营地位谋取私利，专营所得高利润必须收归国库。四是强化个体、私营经济的税收征管工作，同时实行严格的物价管理制度。五是加强法制，对各类企业都要求严格执行国家的各项财务、税收、物价政策，依法经营，依法纳税；对于偷税、漏税、抗税以及从事非法经营的单位或个人，应当依法予以制裁，触犯刑律的要追究刑事责任。

稳定市场还必须对物价进行有效控制，使其上涨幅度控制在一个适当的限度以内，保持基本稳定状态。物价上涨的原因固然是由供求不平衡引发的，但通货膨胀则是造成物价上涨的根本原因。为了遏制通货膨胀，必须严格控制货币发行，使货币流通量的增长符合经济稳定发展的需要。